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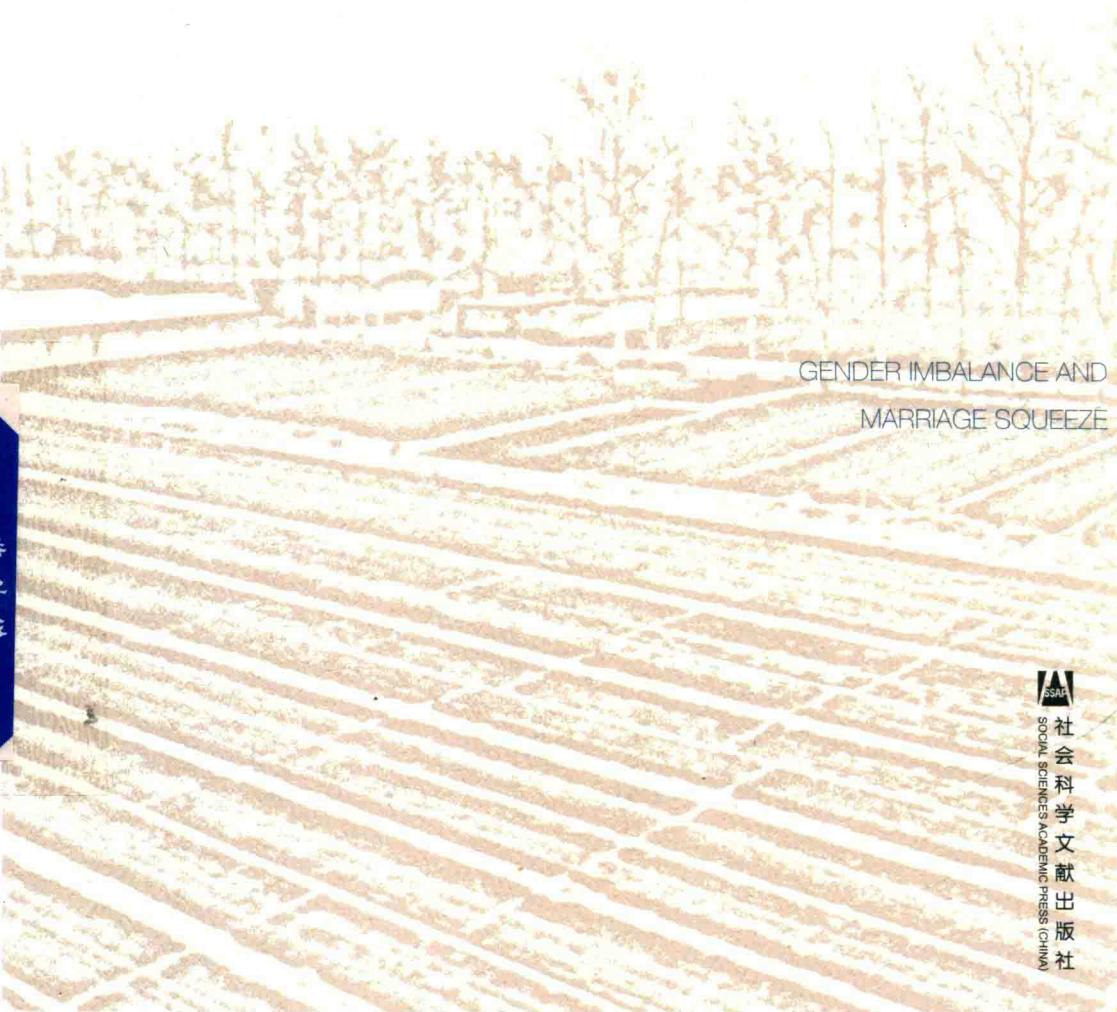
西安交通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学术文库

MARRIAGE SQUEEZE

性别失衡与 婚姻挤压

姜全保 李树苗 / 著



GENDER IMBALANCE AND
MARRIAGE SQUEEZE

译丛

SSAP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西安交通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 学术文库

性别失衡与 婚姻挤压

姜全保 李树苗 / 著

GENDER IMBALANCE AND
MARRIAGE SQUEEZ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 / 姜全保, 李树苗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1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201 - 3753 - 9

I. ①性… II. ①姜… ②李… III. ①人口性别构成
- 研究 - 中国 ②婚姻问题 - 研究 - 中国 IV. ①C924.24
②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1772 号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学术文库 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

著 者 / 姜全保 李树苗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周 丽 高 雁

责任编辑 / 王楠楠 郭 欣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5.5 字 数：256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753 - 9

审 图 号 / GS (2018) 6769 号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5ZDB136）“人口普查质量评估理论创新研究”
阶段成果

总序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一直致力于社会性别歧视与弱势群体问题的研究，在儿童、妇女、老年人、失地农民、城乡流动人口和城镇困难企业职工等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发展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所注重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已承担并成功完成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在弱势群体、人口与社会发展战略、公共政策研究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研究所拥有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与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杜克大学、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南加州大学、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圣塔菲研究所等国际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关系，形成了研究人员互访和合作课题研究等机制；同时，研究所多次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计划、美国 NIH 基金会、美国福特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资助，合作研究了多项有关中国弱势群体问题的科研项目。国际合作使研究所拥有了相关学术领域的国际对话能力，扩大了国际影响力。

研究所注重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已形成了与国家、地方各级政府的合作研究网络，为研究的开展及研究成果的扩散与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和保障。研究所多次参与有关中国弱势群体、国家和省区人口与发展战略等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在国家有关部门、国际机构的共同合作与支持下，在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女童生活环境等领域系统地开展了有关弱势群体问题的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应用于实践，进行了社区干预与传播扩散。1989 年以来研究所建立了社会实验基地 6 个，包括“全国 39 个县建设新型婚育文化社区实验网络”（1998~2000 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巢湖改善女孩生活环境实验区”(2000~2003年,美国福特基金会、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社会性别引入生殖健康的实验和推广”(2003年至今,美国福特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其中,“巢湖改善女孩生活环境实验区”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各界对男孩偏好问题的重视,直接推动了全国“关爱女孩行动”的开展。

近年来,研究所开始致力于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方法、政策和实践的系统研究,尤其关注以社会性别和社会弱势人群的保护与发展为核心的交叉领域。作为国家“985工程”二期“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策与管理创新”研究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所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人口与社会复杂系统的一般理论、分析方法与应用研究——探索人口与社会复杂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人口与社会复杂系统的一般特征及结构,建立人口与社会复杂系统模型,深入分析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人口与社会问题并为其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人口与社会政策创新的一般理论、分析方法与应用研究——分析人口与社会政策创新的理论内涵与模式,人口与社会政策创新的政策环境、条件、机制、过程与应用,建立人口与社会政策创新评估体系;转型期面向弱势群体保护与发展的社会政策创新研究、评价与实践——以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研究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社会的融合过程,分析农民工观念与行为的演变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农村流动人口与社会后果,探索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的途径,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国家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与应用——在人口与社会复杂系统和人口与社会政策创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弱势群体研究所得到的结果,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从应用角度建立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形成相应的数据库、模型库、知识库和方法库,解决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战略问题。

中国社会正处于人口与社会的急剧转型期,性别歧视、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弱势群体生活困难等问题日益凸显,社会潜在危机不断增大,影响并制约着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有利于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以社会性别和弱势群体保护与发展为核心的人口与社会问题。本学术文库将陆续推出其学术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 男孩偏好	1
二 性别失衡	4
三 婚姻挤压	6
四 本书结构	8
第二章 出生性别比数据质量	11
一 引言	11
二 数据来源	12
三 数据评估	13
四 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的范围	17
五 小结	24
第三章 出生性别比和流产比例的估计	25
一 引言	25
二 方法	25
三 结果	29
四 小结	44
第四章 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	46
一 引言	46
二 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	46

三 出生性别比区域差异	50
四 小结	60
第五章 出生性别比的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	62
一 引言	62
二 文献综述	63
三 研究方法	68
四 数据与变量	70
五 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71
六 空间面板分析结果	78
七 小结	83
第六章 出生性别比变化的孩次分解	86
一 引言	86
二 分解方法	87
三 数据	88
四 结果	90
五 小结	97
第七章 出生性别比变化的省级分解	99
一 引言	99
二 方法	100
三 数据	102
四 结果	103
五 小结	108
第八章 1980 ~ 2010 年失踪女性	117
一 引言	117
二 方法和数据	119
三 失踪女性数量和比例	122
四 分省趋势	123

五 小结.....	126
 第九章 男性过剩..... 128	
一 引言.....	128
二 方法和数据.....	129
三 男性过剩变化趋势.....	129
四 城乡差异.....	134
五 教育差异.....	137
六 职业差异.....	141
七 男性过剩的影响.....	143
八 小结.....	148
 第十章 出生性别比与人口发展..... 150	
一 引言.....	150
二 方法.....	151
三 数据.....	152
四 分解结果.....	154
五 未来人口发展预测结果.....	157
六 小结.....	161
 第十一章 未来婚姻挤压..... 163	
一 引言.....	163
二 方法.....	164
三 数据.....	168
四 结果.....	170
五 小结.....	174
 第十二章 婚姻挤压、终身未婚比例和初婚年龄..... 176	
一 引言.....	176
二 方法.....	177
三 数据.....	181

四 结果	182
五 小结	185
第十三章 婚姻挤压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分解	188
一 引言	188
二 婚配性别比及其分解	190
三 预测及参数	192
四 结果	197
五 小结	201
第十四章 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的生命周期	204
一 引言	204
二 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	205
三 测算方法	207
四 数据	209
五 结果	210
六 小结	215
参考文献	217

位，社会秩序由男性构建，只有男孩能延续家庭姓氏，一个孩子只能通过父亲获得其社会身份并融入社会秩序中，妇女的价值主要通过生育子女的能力，特别是生儿子的能力来评判；父权制度（patriarchy）使得妇女被限制参与家庭以外的经济活动以及对外交流，女性不得不依附于男性，地位十分低下；从夫居制度（patrilocality）意味着女儿嫁到其他家庭，她们婚后属于丈夫的家庭，与娘家只有感情上的联系，没有实质性的权利和责任，主要生产性资产由男系传承，妇女只能以嫁妆或遗产方式获得可移动物品（李树苗等，2006；Jiang et al.，2011b）。相比于女儿，儿子具有更多的优势，从经济方面来看，儿子能够提供传统农业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力，提供给父母养老支持，儿子将儿媳妇娶进门不但可帮助做家务，还以嫁妆的形式提高了家庭经济水平；从社会文化方面来看，儿子能够传宗接代，延续家庭姓氏，儿子多能提升家庭地位，而女儿要嫁到别人家里。当男人占主导地位的家庭权力被男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拥有的制度法律建构、意识形态以及分配资源等方面的权力代替之后，社会秩序由男性构建，对妇女的生活控制就从私人父权制转向公共父权制，产生了一个将妇女置于从属地位的支配体系。这样，就形成了强烈的男孩偏好和对女性的歧视。

历史上，对女性的歧视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溺弃女婴是女性歧视的一种极端表现方式，广泛存在于 20 世纪 50 年代前的中国社会（Wolf and Huang，1980）。这种对子女性别进行选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 2000 年，那时面对环境的压力女孩是溺婴的主要受害者（Croll，1978）。即使贵为皇室成员，一些女婴也被溺杀（Lee and Wang，1999）。溺弃女婴现象的直接影响是女孩数量的减少和性别比的失衡。就古代和近代中国而言，总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人口性别比较高（Ho，1959；葛剑雄，1991）。历史上经常性的性别比偏高，是溺弃女婴习俗长期作用的结果，这与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强烈男孩偏好直接相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直接溺弃女婴这种极端方式被禁止，但是间接溺弃女婴现象，比如在食物、医疗、营养、照料等方面对于女孩的歧视性待遇导致女孩死亡水平依然偏高。偏高的女孩死亡水平在 20 世纪的中国一直存在，尤其在战争和饥荒等资源受到严重约束的时期，女孩死

亡水平偏高更加明显 (Das Gupta and Li, 1999)。1950 年之后, 偏高的女孩死亡水平和儿童生存中的性别差异存在时间和空间差异, 与一些社会经济变量有关, 同时也与儿童生存环境中的男孩偏好因素有很大关系 (李树苗、Feldman, 1996)。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对夫妻生育数量的严格限制, 以及性别鉴定技术和流产技术的普及,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开始上升。在没有生育政策限制的时候, 人们可以通过多生来达到有儿子的目的, 所以很少有夫妻求助于性别选择以保证家里有一个儿子, 而且 80 年代之前也没有可靠的性别鉴定技术。而随着生育数量的限制, 即使在允许生育二孩的情况下, 依然会有大约 25% 的人口不能生育儿子, 而比较严格的一孩政策以及其后调整的一孩半政策 (即在大部分省份的农村地区, 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 还可以再生育一个) 更是使得很大一部分家庭没有儿子。在性别鉴定技术可以获得的情况下, 一些夫妻就会在某些胎次求助于性别选择以保证有一个儿子。Li et al. (2000) 定义了性别选择处境 (sex selection situation), 即一个妇女可能会使用一种性别选择方法来决定下一个孩子的性别; 性别选择压力 (sex selection pressure), 即一个妇女在生育过程中处于性别选择处境的概率。在定义性别选择处境、性别选择压力和男孩偏好强度的基础上, Li et al. (2000) 建立了男孩偏好 (son preference)、出生性别比和生育率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式, 发现当存在男孩偏好时, 中国生育率的明显下降引起了性别选择压力的显著增加, 后者又引起了出生性别比的显著上升。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尤其是 80 年代和 90 年代, 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是生育政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 严格执行的生育政策可以解释性别比上升中的绝大部分 (Li et al., 2011)。

局部地区的数据分析表明多于 25% 的女胎以流产告终, 而男胎流产的比例只有 1.6% (Chu, 2001)。用胎儿性别鉴定后的选择性人工流产可以全部解释我国 1990 年观测到的超常出生婴儿性别比 (李涌平, 1993)。人工流产和出生性别比时间趋势和变化模式的一致性, 揭示了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是实现男孩偏好的主要途径, 对出生性别比的上升具有重要影响 (韦艳等, 2005)。男孩偏好影响了中国的出生性别比, 进而影响到中国的性别平衡。

二 性别失衡

出生性别比偏高即出生婴儿男多女少，导致中国的失踪女性现象和性别失衡。伴随着出生人口达到婚姻年龄，这种性别失衡表现为婚姻市场上男多女少，男性存在婚姻挤压。

(一) 出生性别比

出生性别比是活产男婴和女婴的数量之比，通常用每 100 名活产女婴所对应的活产男婴的数量表示，正常范围为 102 ~ 107。中国的普查数据和历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持续升高，到 2000 年之后在 120 左右波动，近来开始下降。

出生性别比的水平存在争议。目前有很多部门统计了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数据，但数据并不一致，甚至差距较大。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有出生性别比数据，但存在因计划生育考核而带来的瞒报漏报问题 (Zhang and Zhao, 2006)。公安部门也根据户口登记数据统计了出生性别比，但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有 1300 万人没有户口，大部分是因为超生而没有上报户口 (李林, 2015)。国家统计局统计了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许多学者对这些数据的质量进行了评估 (Zhang and Zhao, 2006; Goodkind, 2011; Cai, 2017)，发现这些数据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低年龄段的瞒报漏报问题，至于是男孩漏报多还是女孩漏报多也存在争议。

在讨论数据质量的时候，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指直接比较或者分析出生性别比的数值，而忽略了影响出生性别比统计的一些基本因素比如样本量 (乔晓春, 2006)。实际上，由于历年调查样本量的变化，即使在没有性别选择性流产状况下的出生性别比可能的区间也非常大，偏离正常水平。而仅仅通过观测到的出生性别比并不能准确判断出出生是否受到性别选择性流产的影响。

出生性别比存在明显的孩次差异，随孩次增加而升高。1982 年的普查数据显示一孩和二孩出生性别比正常，三孩及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别比为 110.1，高出正常水平；2000 年的普查数据显示，一孩出生性别比为 107.1，基本属于正常范围，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出生性别比都在 150 以上；2010 年的普查数据显示一孩的出生性别比也已经达到了 113.7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1993, 2002, 2012)。而随着生育意愿和行为的转变，出生人口的

孩次构成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1990 年普查数据显示一孩出生数量占总出生数量的 49.50%，而 2010 年该比例达到 62.17%（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1993, 2012）。孩次构成发生了变化，不同孩次对于总的出生性别比和出生性别比变化的贡献也不同。2000 年普查长表数据的出生性别比为 119.92，2005 年的出生性别比为 120.5，高于 2000 年。但如果使用 2000 年的出生孩次结构把 2005 年的出生性别比标准化，则 2005 年的出生性别比降为 118.6，低于 2000 年（Goodkind, 2011）。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一孩出生性别比也偏高，这从根本上与普遍存在的男孩偏好有关，而生育水平的下降，不管是严格的生育政策限制还是自身比较低的生育意愿，加剧了这种现象。当前，低生育率不再是生育政策的结果，而是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人们低生育意愿的反映，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政策并没有达到提高生育水平和数量的预期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人为了保证生育男孩，会在第一孩就实行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微观数据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Jiang et al., 2016a）。

除了孩次差异，出生性别比还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各省份的出生性别比变化会影响全国的变化，全国出生性别比的变化是各省份出生性别比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蔡菲（2007）利用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各省份对全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贡献，发现有 11 个省份对全国出生性别比的升高影响较大（贡献率在 4% 以上）。王钦池（2014）利用 2000 年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和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出生性别比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人口大省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贡献仍然较大。Jiang et al. (2017) 把出生性别比的变化分解为出生女婴孩次比例和分孩次出生性别比的变化，分析了其对全国和分省出生性别比变化的影响。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问题是一个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复杂的阶段性问题。一些学者乐观地判断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会像韩国一样恢复正常（Guilmoto, 2009；Das Gupta et al., 2009）。近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确实正在以较快的速度下降，但目前的出生性别比仍然高于正常水平。可以预见，出生性别比会恢复到正常水平。但是，过去 30 余年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所带来的人口社会后果在逐步显现，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二）失踪女性

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导致了庞大的失踪女性数量。“失踪女性”是 Sen

(1989, 1990) 提出的一个概念, 用以度量女性歧视所带来的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数量短缺。比较一个实际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和另外一个在正常出生性别比和死亡水平假设下的模型人口, 如果实际人口的性别比超过了模型人口的性别比, 那么为了匹配模型人口性别比而缺少的那部分女性人口, 就可以看成“失踪女性”的数量 (Klasen and Wink, 2002; Cai and Lavelle, 2003)。Coale and Banister (1994)、Jiang et al. (2012a) 等测算出了历史上失踪女性的数量。Jiang et al. (2012b) 使用普查数据分析了 1980~2010 年的中国失踪女性数量, 发现 1980~2010 年出生队列失踪女性有 2000 万人。总体来说对中国目前的失踪女性的分析还比较少, 尤其是中国区域差异很大, 分省的区域差异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三 婚姻挤压

一个人进入婚龄后, 就纳入了婚姻配偶的供给和需求关系体系, 在这个体系内进行比较、选择和匹配, 这种婚龄期男性和女性择偶关系的总和称为婚姻市场 (郭志刚、邓国胜, 2000)。婚姻市场有三个关键因素: 供给、偏好和资源。供给就是婚姻市场上寻找配偶的男女; 偏好就是择偶男女希望配偶具备某些特征, 如对身高、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要求; 资源指择偶男女自己所展示的一些特征, 如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 (孙淑敏, 2005)。人们带着一定的资源进入婚姻市场, 根据拥有资源的多少来评估自己, 同样也评估潜在的配偶。

在一夫一妻制社会中, 如果婚姻市场不平衡, 婚龄男女人数相差较大、比例失调, 由此导致一部分男性或女性择偶发生困难, 这一现象称为婚姻挤压 (郭志刚、邓国胜, 2000)。婚姻挤压是因为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不合理”, 也即婚姻挤压是一个人口性别年龄结构问题 (陈友华, 2004)。婚姻挤压减少了处于被挤压状态人口的结婚机会, 导致单身比例的上升, 并使得处在婚龄段的男性成婚困难, 男性终身不婚率升高 (石人炳, 2006)。

2000 年人口普查之后,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及今后会有 3000 万~4000 万婚龄男性不能或无法正常结婚, 中国将进入严重的婚姻挤压阶段, 每年将新增数以百万的年轻男性找不到异性配偶。由于大多数婚姻是在同一阶层内部缔结, 当同一阶层内部出现较严重的婚姻挤压时, 跨阶层的婚

姻将增多，导致婚姻挤压后果主要由底层人士来承担。由于男性过剩，各地区婚姻市场存在男女供求不平衡，女性会有更多的选择，从而导致大量由农村到城镇、由西部贫困落后地区向东部沿海较富裕地区的女性婚姻迁移。而贫困农村的男性婚龄群体作为择偶的“弱势群体”，成为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直接受害者。不能成婚的男性主要分布在农村，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在社会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

如何测度婚姻挤压程度是一个问题。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测度婚姻挤压时主要是比较男女的数量关系，往往选用性别比指标。很多性别比指标把结婚年龄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这样对于男性和女性人数的变动反应比较灵敏。但由于结婚的年龄范围通常比较大，把结婚年龄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往往不能对婚姻市场供需情况总体进行分析。Tuljapurkar et al. (1995) 使用了潜在初婚比指标来度量婚姻市场潜在的两性相对规模差异，这个指标弥补了以往年龄范围太小的不足，但使用的初婚频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婚姻进度效应的影响。在中国这样一个婚姻和生育推迟幅度比较大的国家，潜在初婚比指标在使用初婚频率的时候由于没有考虑进度效应而低估了婚姻市场的挤压程度。Jiang et al. (2011a) 设计了几种改进的潜在初婚比指标，包括考虑基年的性别比，考虑初婚频率的进度效应，把总和初婚率标准化等。总体来说，在婚姻挤压的度量及对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的预测上，没有统一的结论。

当前很多婚姻挤压的测度是基于人口总量，并没有区分男女的婚姻状况。男多女少和大部分人口都能结婚的事实，使得真正受到挤压的是那些男性未婚人口。婚姻市场上男性未婚人口受到的挤压比依据人口总量测算出来的挤压程度严重得多 (Jiang et al. , 2014a)。Jiang et al. (2014a) 的研究发现，若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从 2010 年开始下降，到 2040 年恢复正常，那么从 2010 年开始，中国未婚人口的潜在初婚比迅速上升。婚姻挤压会使终身不能成婚的人口增多，随着这些人口步入老年，老年未婚群体没有完整的家庭，缺少妻子和子女的照料，再加上本来就经济贫困、社会地位相对低下，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会更加强烈 (Ebenstein and Sharygin, 2009; Sharygin et al, 2013)。因此这需要测度婚姻挤压对男性终身未婚的影响，以提前进行养老保障方面的制度设计。

中国的男性婚姻挤压既受到性别结构的影响，也受到年龄结构变动的

影响。由于出生性别比偏高和人口性别失衡，当前的报道和研究把中国男性的成婚困难主要归结于性别失衡。但是，不同婚龄的男女进行匹配时，不仅受到人口性别结构的影响也受到年龄结构的影响。婚姻挤压问题是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对真实婚姻市场的一个简化，Ebenstein and Sharygin (2009) 发现婚姻市场上女性短缺是由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和性别失衡双重原因引起的。Guilmoto (2012) 把自己构建的婚姻挤压指数分解成两部分，即年龄结构因素和性别结构因素，他通过模拟发现 2050 年之后年龄结构对婚姻挤压的影响超过 50%。Goodkind (2006) 甚至认为，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结婚峰值年龄的性别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年龄结构，而不是产前或者产后对胎儿或者女婴的歧视。中国的男性婚姻挤压是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现有的研究中还没有很好的方法可以把两者的作用区分开来 (Jiang et al., 2016b)。

大量未婚男性的存在产生了一种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即一个（或几个）大龄未婚男性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这样的家庭的生命周期有其独特性 (Jiang et al., 2013a)。由于大龄未婚男性没有结婚、生育、抚养子女等事件，所以他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家庭的主要事件就是死亡，根据死亡可以将大龄未婚男性的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双亲共居阶段、单亲共居阶段、单独居住阶段。目前的研究对于这种家庭的生命周期关注得比较少 (Jiang et al., 2013a)。

四 本书结构

本书主要研究中国以偏高出生性别比为特征的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问题。全书结构及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中国的男孩偏好、出生性别比与失踪女性所代表的性别失衡，以及婚姻挤压研究，并给出全书的结构。

第二章，出生性别比数据质量。主要探讨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可能原因及变化趋势。根据全国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探讨了没有性别选择性流产情况下给定样本量对应的出生性别比可能范围。

第三章，出生性别比和流产比例的估计。根据观测到的历年出生性别比，分析出生性别比的可能区间，并根据贝叶斯统计测算了可能的流产比